

两岸“制度之争”论

——兼议“一国两制”的优越性

◎王 猛

[摘要]“制度之争”以及其所代表的两岸之间是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之争的观念在台湾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两蒋时期、李登辉陈水扁时期以及2008年以来,台湾当局基本延续了这一思维。但“制度之争”的本质是台湾当局与部分国际势力谋求政治利益的一个筹码,两岸之间存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是台湾问题的本质。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化解两岸所谓“制度之争”、完成国家统一的最优模式。

[关键词] 两岸;制度之争;一国两制

[作者简介] 王猛,男,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硕士。福建 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 D67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562(2011)03-0038-04

所谓“制度之争”,即两岸对于中国在什么制度下实现统一的争议,这一争议产生于台湾当局对“一国两制”的歪曲理解。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主张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共存于一国之中。针对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的国家统一模式,当时的国民党当局提出另一种诠释,认为“制度之争”才是造成中国不能统一、两岸分裂分治的本质与根源。国民党当局认为:“民国”以来,国共双方所争的即是意识形态的差异,尤其在两岸分隔40几年后,更是明显地形成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三民主义中国”与以马列主义为根源的“共产主义中国”之争,也就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之争。^[1]直至今天,台湾虽经过“政党轮替”,但历任台湾当局及其领导人基本延续了这一立场,认为两岸“两制”实际上意味着“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对立,这两种制度无法共存于一国。

本文以台湾当局提出的所谓“制度之争”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其来源、发展,结合两岸关系的历史和现状来揭示这一命题的本质,并进一步证明“一国两制”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是化解所谓“制度之争”、实现中国和平统一的最优方式。

一、“制度之争”议题来源及其发展

虽然国民党抛出“制度之争”议题至今的历史有限,但国共两党围绕中国实施什么社会制度以及两

岸统一于什么制度之下的争议由来已久。五四运动最终导致了当时的中国知识精英在“中国走什么道路”问题上的争论,论辩双方分别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旗帜下,这是“国共对立”的思想根源。1949年后的两岸分离正是国共内战的结果,50多年的分离成为当代两岸关系深刻的政治文化差异的原因。^[2]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围绕中国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展开较量,最终形成了隔海对峙的局面,彼此分属冷战中东西两大阵营。国民党当局承袭了冷战思维尤其是作为冷战思维核心的反共意识形态,而这种思维使后来的国民党当局抛出两岸“制度之争”这一议题。从两蒋时期、李登辉陈水扁主政时期到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台湾当局针对中国统一于什么制度而与大陆产生的“争议”在台湾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但这种“争议”各阶段具体表现略有不同。

(一)两蒋时期,两岸“制度之争”表现为台湾当局以“三民主义”与大陆争夺代表“全中国”的“法统”。

1949年至1988年,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以“反攻大陆”为主轴,尽管其间于1958年将政策调整为“建设台湾,光复大陆”,并称“光复大陆”主要依靠“三民主义”,但台湾当局始终未放弃对新中国政权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敌视。这一时期,国民党当局对大陆进行负面宣传,在台湾贯彻全面的反共、恐共和

仇共教育,将大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描述为“共产暴政”、“匪伪政权”,宣称“唯有三民主义才是救中国、救中国人民的唯一大道”。1970年召开的国民党“十大”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积极策进光复大陆案”,该案中台湾当局积极鼓吹三民主义,宣称要肃清共产主义思想,并以此作为其光复大陆的基本目标。^[3]1979年12月,国民党召开十一届四中全会,蒋经国在开幕式上首次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1980年,蒋经国又强调“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使中国成为自由、和平、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唯一可行的道路”。^[4]可见,两蒋父子时期的大陆政策前后虽有调整,但以“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体制”来恢复“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之“法统”的企图从未改变,两岸之间的对峙始终伴随着“制度之争”的阴影。

(二)李登辉、陈水扁主政时期,两岸“制度之争”表现为台湾当局以“自由民主”制度来争取“台湾独立”。

李登辉主政后加快了“宪政改革”和政治转型,以1996年“总统”民选为标志,台湾基本建立了西式民主政治的框架。国际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中国成为西方“和平演变”的主要对象。在这种海内外形势下,李登辉一方面配合国际反华势力,妄图以台湾“民主经验”来“影响”大陆。1988年7月,国民党“十三大”首次制定了“现阶段大陆政策案”,将大陆政策的总目标确立为“消除马列主义共产制度的专制统治,建设自由、民主、均富、和平、统一的新中国”;现阶段的目标是“扩展台湾经验,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发挥政经影响,争取大陆民心”。^[5]另一方面,李登辉以“民主”为借口,不断通过“宪改”等措施加紧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妄图借“中华民国”的招牌变台湾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并最终于1999年提出“两国论”。陈水扁主政时期更是囿于民进党“台独”意识形态,拒绝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反对“一国两制”,认为“两制”就是将台湾香港化,变成地方政府、香港第二。^[6]同时,陈水扁当局以“一边一国论”来定位两岸关系,以“民主”为幌子、以“公民投票”和“宪政改造”为手段来推动台湾“正名”、“制宪”和“去中国化”等“法理台独”活动。

总之,李、扁主政时期,台湾的“民主政治”成为二者抵制统一和“一国两制”的借口,以两岸制度不同和大陆“不民主”为理由抗拒两岸统一及其他政治议题谈判;另一方面,“民主”又成为李、扁二人进行

“台独”分裂活动的挡箭牌,他们企图在“民主”口号下推动“台湾独立”。

(三)2008年以来,两岸“制度之争”的表现为马英九当局以台湾“民主制度”来抗拒统一,维持两岸“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

2008年,国民党籍马英九上台执政,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两岸建立了最基础的政治互信。但马英九当局依然没有放弃两岸“制度之争”的思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李登辉、陈水扁将两岸制度差异作为拒绝统一条件的做法,台湾当局的“民主牌”甚至在马英九上台后继续得到强化。马英九个人具有鲜明的反共意识形态,他一方面继续反对“一国两制”,而将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作为两岸协商统一的前提条件,在统一问题上,马英九曾经一再强调以“民主、自由、均富”的社会制度来实现两岸统一,坚持所谓“六四不平反,统一不可谈”等;另一方面又意图以台湾“民主灯塔”的地位和“民主成就”来作为大陆的示范,以此来“影响”大陆,主张两岸应政治争议,从事“制度竞赛”。马英九在其2008年5月的“就职演说”中提到,“两岸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不在主权争议,而在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由衷盼望中国大陆能继续走向自由、民主与均富的大道,为两岸关系的长远和平发展,创造双赢的历史条件”。^[7]笔者认为,马英九当局这种以台湾“民主成就”与两岸制度差异来抗拒统一、维持两岸“不统、不独”现状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使台湾问题与两岸统一变得更加复杂、棘手。

二、两岸“制度之争”的本质

台湾当局把两岸问题归结为一种两岸间的“制度之争”,甚至企图以台湾的“政治经验”来引导大陆走上“民主化”之路,并以此作为两岸统一的前提条件。但根据“一国两制”构想,大陆不主张在两岸之间搞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争,两岸统一“谁也不吃掉谁”,这就使“制度之争”成为一个“假议题”,成为台湾方面回避两岸政治谈判与国家统一问题的“挡箭牌”。台湾问题的核心也是祖国统一,“一国两制”的核心是“一国”,即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主张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本身就表明了大陆实践“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决心和诚意。事实证明,台湾当局反对的不是“两制”而是“一国”,尤其李登辉主政后期与陈水扁时期,台湾当局变本加厉地推行“去中国化”与“台独”政策,进一步暴露了其分裂国家的本质,而所谓“制度之争”只是他们的幌子。

此外,“制度之争”这一议题还被台湾当局拿来作为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持的筹码,台湾当局妄图以此来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并携海内外“台独”势力与国际反华势力共同应对祖国大陆统一“攻势”。美国作为影响台湾问题解决的最主要外部因素,其对台政策实质上是维持“不战不和、不统不独”的现状,一方面要利用台湾的战略位置实现其“以台制华”策略;另一方面,美国希望台湾成为“和平演变”中国大陆的政治力量,于是不遗余力地要推动台湾的“民主化”实现其扩展“民主”的理念,以达到“以台变华”的目的。^[8]这样的美国的对华、对台战略成为历任台湾当局领导人得以“挟洋自重”的国际基础,尤其“以台变华”策略更成为推动台湾当局不断在两岸关系上操作“制度之争”议题的国际因素。

之所以台湾当局能够挑起两岸“制度之争”的议题,笔者认为根本原因还是其对台湾问题的歪曲定位。“对台湾问题的正确定性,关系到两岸对话和交往立场的基础,关系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关系到两岸关系发展的方向。”^[9]包括所谓两岸“制度之争”在内,海内外针对台湾问题性质的定位曾提出“制度之争”、“贫富之争”、“吞并反吞并之争”、“民主与专制之争”乃至“两国论”、“一边一国”论等论调,这些定位不仅无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很大程度上干扰、破坏了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笔者认为,两岸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首先应该还原台湾问题的本来面目,准确定位台湾问题的性质。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末发表的新时期大陆对台政策的“六点意见”中指出,“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两岸复归统一,不是主权和领土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10]这就进一步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明确台湾问题的性质,即“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从而也间接否定了台湾问题是两岸之间的“制度之争”的论调。

我们应该承认两岸之间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的客观差异,但这不应该成为两岸协商统一的前提,“一国两制”则是化解所谓两岸“制度之争”,排除两岸在制度差异问题上无谓的纠缠的最好方式。当前,两岸之间在两岸政治定位、两岸军事安全互信、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与活动等问题上还存在极大争议,双方应该按照“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程序逐步推动两岸关系深入稳定发展,为解决政治

难题创造条件。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时期,“制度之争”不应再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干扰因素,台湾当局据以炒作这一议题的冷战思维亦当休矣。

三、以“一国两制”化解两岸“制度之争”

(一)“一国两制”的内涵

“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不好吞掉谁。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11](P59)基于两岸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及民众生活方式的差异和台湾问题最终要和平解决的考量,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后来逐步发展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大陆对台政策基本方针。“一国两制”的基本内涵是,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在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它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到台湾、香港、澳门的历史和现实,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是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12]

(二)“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凸显“制度之争”的虚伪性

“一国两制”方针充分考虑到两岸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及部分台湾同胞对统一的疑虑,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统一后台湾将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利,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甚至军事、外事方面的自主权。中共十六大将此概括为“两个不变”(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三个获得”(台湾同胞获得以祖国大陆为腹地的广阔空间发展经济,获得与大陆同胞一道管理整个国家的权利,获得与大陆同胞共享伟大祖国在国际上尊严和荣誉的权利)。^[13]因此,“一国两制”本身就意味着两岸之间不再搞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争,而是谋求双方和平相处,两岸共同发展,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香港、澳门十多年的“一国两制”实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方针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从民主建设来看,‘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体现了两种不同民主制度的共存和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14]

近年来台湾当局声称“大陆的民主化是中国再统一的关键”、“两岸问题的真正本质是制度竞赛”,以此欺骗台湾同胞与国际舆论。中国大陆主张按照“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和平统一,允许海峡两岸两种社会制度共存且互不强加于对方,最能体现两岸同胞的意愿,这本身就是民主的。两岸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应构成和平统一的障碍。而且,中国政府注意到台湾与香港、澳门的不同特点,在台湾落实“一

国两制”条件比香港、澳门更宽松。台湾当局基于冷战、零和思维主张大陆13亿人民实行台湾的政治、社会制度是不现实也不民主的。因此,所谓“制度之争”本质上是一个“假议题”,两岸双方的争议不是要实行何种制度的问题,而是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还是要分裂的问题,台湾当局以“制度之争”反对“一国两制”,这与和平统一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站不住脚的。

(三)按照“一国两制”完成和平统一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好方式,不仅符合两岸的共同利益,实现两岸关系发展的双赢,而且也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相一致,国际社会亦应乐观其成。

“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历来是两岸中国人共同追求的目标,台海和平符合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就算台湾亲绿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罗致政就曾指出,“台湾内部的朝野政党以及政府民间,即使统独立场不同,或者政治认同存在差异,但对于和平的坚持,绝对是共同的语言,也是一致的看法。”^[15]

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也深知台湾“独立”意味着台海必然出现两岸甚至中美之间军事冲突,这严重威胁台海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因而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台独”势力铤而走险的挑衅行为。美国作为台湾问题产生与延续的最主要外部因素,它支持台海和平的态度也是比较明确的。1978年12月中美发表建交公报前,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深信,台湾人民将有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未来,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16]美国在其1979年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声称:“美国作出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以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种期望为基础的;凡是企图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都将会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17]

总之,维护台海和平、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符合两岸主流民意,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国际社会也“希望两岸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不管最终结果是中国统一还是‘台湾独立’;在中国排除接受‘台湾独立’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有可能接受‘一国两制’或类似于‘一国两制’的解决方式。”^[18]

四、结论

“‘一国两制’才是真正放弃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之争,从根本上尊重对方,从内心深处寻求和平双赢的解决两岸政治之争的大气度的大构想,也完全符合当今世界多元化发展情势,符合两岸社会各自

的政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现实,照顾到了台湾朝野在心理上、现实利益上的需要,也在‘两制’之下,为台湾消化其内部的‘台独’思想留有空间。”^[19]因此,台湾当局与各政党应该基于两岸关系长远健康发展而放弃“制度之争”的思维,还原两岸关系与台湾问题的本来面目。此外,由于李登辉、陈水扁主政20年期间的“去中国化”操作,“一国两制”在岛内已经遭到妖魔化,部分民众对“一国两制”歪曲的认知构成“制度之争”议题的民意基础。因此,排除岛内民众心理认知上的“失真”、正确宣导“一国两制”的内涵,有助于落实“一国两制”、创造民意基础并化解“制度之争”这一议题。

参考文献:

- [1] 民进党中国大陆政策回顾[EB/OL].<http://www.cqzg.cn/viewthread-198115.html>.
- [2][3][4][5][6] 刘国深等.台湾政治概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
- [7] 马英九.人民奋起,台湾新生[N].(台湾)中国时报,2008-5-21(A7).
- [8] 沈惠平.美国对台政策新解[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12.
- [9] 刘红.对台政策和理论的重大创新[EB/OL].<http://gb.china-reviewnews.com/cn-webapp/search/allDetail.jsp?id=100851280&sw=%E5%88%B6%E5%BA%A6%E4%B9%8B%E4%BA%89>.
- [10] 胡锦涛.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9-1-1(2).
- [11][1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2][13]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台湾问题外事人员读本[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
- [14] 成正、王龙国.“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政治学分析[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4):73.
- [15] 罗致政.飘逸的岛屿—大国夹缝中的台湾[M].(台湾)前卫出版社,2009.110.
- [18] 范希周.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 [19] 吴越.马英九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EB/OL].<http://gb.china-reviewnews.com/cn-webapp/search/allDetail.jsp?id=101244701&sw=%E5%88%B6%E5%BA%A6%E4%B9%8B%E4%BA%89>.

责任编辑:徐映奇